

新兴市场国家政治信任的 生成逻辑、影响因素及功能*

——基于海外文献（2010–2024）的研究综述

孙 浩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家治理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政治信任作为政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被认为是现代国家政治体系得以稳定运行的重要因素。早期政治信任相关研究多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验展开。然而，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出现政治信任持续下滑的趋势。对此，西方发达国家政治信任的相关理论研究解释乏力，海外学者逐渐将研究视野由西方发达国家扩展至新兴市场国家，试图探讨不同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下政治信任的生成逻辑与运行内理。通过梳理2010年以来海外关于新兴市场国家政治信任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海外研究主要围绕国家能力、文化属性与社会资本三条路径展开，构成新兴市场国家政治信任生成的基本逻辑框架。从宏观国家场景、中观制度运行到微观公民感知，多个层级对政治信任产生影响。当国家能够有效构建和维护政治信任时，其所带来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信任红利”将有助于提升国家的整体治理效能。基于海外关于新兴市场国家政治信任的研究，启示我国未来的政治信任研究应更加立足本土政治实践与社会语境，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信任评价体系，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下的政治信任理论。在实践层面，要通过深化反腐倡廉，提升政府透明度，以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巩固和强化政治信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新兴市场国家 政治信任 腐败 人际信任

[中图分类号]D03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983X(2026)01-0107-14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引起学术界与实务界热议的是：民众对政府的支持率逐年下降，这是否会引发危机。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美国自2007年以来，政治信任度不到

三成，目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接近历史低点。政治信任下降不仅仅是发达经济体国家“专属”，新兴市场国家也备受该议题困扰。所谓新兴市场国家是一个相对概念，即依据世界银行收入划分标准和国际金融公司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定义，将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视为发达国家，其

收稿日期：2024-10-28；修回日期：2025-06-01

*基金项目：202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层人大‘代表链’的运行机制及其优化研究”（23CZZ029）；2024年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式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福建实践与理论拓展研究”（FJ2024C143）

作者简介：孙浩，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

他国家和地区统称为新兴市场国家。^[1]政治信任作为舶来概念,是基于欧美发达国家经验研究中逐步成熟,认为政治信任是指公民对政府的感觉,政府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可以是制度,抑或公职人员,再或司法机构等,具体表达为“信任的基础是公民判断b值得信任,b将以正直和能力行事,并以公民的利益为重,去从事c^[2]。”

相较于海外研究,我国学者一直对政治信任给予学术关怀,积极构建中国政治信任话语体系。如王正绪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出发,构建民本主义分析框架。^[3]还有学者对主体进行类型学划分,讨论如何构建我国青年政治信任。^[4]总之,国内学界从不同维度对政治信任开展多类型研究,各有侧重,为构建中国政治信任话语体系提供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虽然我国政治信任相关研究“百花齐放”,但现有研究成果呈现碎片化态势,研究分散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研究体系,研究尚处“浅水区”。

基于此,本文选取2010—2024年间海外关于新兴市场国家政治信任的既有研究成果作为分析切入点。首先,海外在政治信任的理论建构上已形成体系化成果,通过系统梳理近年来海外研究进展,不仅有助于把握该领域的理论前沿与发展趋势,同时也能为我国学界开展国际学术对话提供理论支撑,进而超越西方主导的话语范式,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语境限制;其次,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等多方面与我国有着共同之处,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已进入“深水区”,对新兴市场国家政治信任的研究,有助于我国深化改革的同时,汲取国家治理建设经验。最后,随着“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持续推进,深入理解新兴市场国家政治信任的构建,有助于我国在对外互动中把握他国政治特征,推动与亚非拉国家间的制度性合作与互信建设。

二、政治信任的生成逻辑

海外研究关于政治信任生成的研究,大致

可归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宏观维度强调文化属性的深层影响,认为政治信任源自于历史文化长期积淀而成的价值观念,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与惯性,不轻易受具体政治事件影响。微观维度多从政府能力视角切入,强调政治信任是公民对政府治理绩效主观评估的结果,即信任源自政府在公共服务、反腐倡廉等具体事务中的表现。为了缓解二者理论张力,中观维度从社会资本视角出发,认为价值观念的形成与绩效认知的转化均需借助社会资本的中介机制得以实现。在社会资本视角下,政治信任既不是静态文化的印记,也并非片面的主观评价,而是在群体互动、社会联系下不断动态建构的过程。

(一) 政府能力视角

在西方分析范式中,政府能力常被界定为政府绩效。公民在感知到政府能够有效提供他们所满意的公共产品、政策时,便会生成政治信任。绩效具体可区分为分散支持与具体支持,前者是对制度本身的接受一般合法性,后者则涉及公民对产出(决策、政策和行动)和政治当局(如领导人和机构)表现的看法。^[5]而具体支持具有动态性,是短期的,分散支持则是稳定的,但二者并非相互独立存在,而是通过动态互动共同影响政治信任的生成。公民对分散支持认知不同会影响具体支持。如公民对民主价值的不同理解会影响其对政府绩效的评价,认为选举和经济安全是民主组成部分的公民,往往对政府表现给予较高评价,而认为政治权利是民主组成部分的公民则对政府表现评价较低。^[6]同样,具体支持对分散支持有着反作用。当公民对政府绩效持续失望时,其对国家价值的信任也会受到削弱。^[7]因此,无论分散支持还是具体支持,均在政治信任生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通过相互作用产生中介效应影响政治信任生成。但上述研究多以政治环境较为稳定的国家为分析对象,那么,对于尚处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中的新兴市场国家该如何解释?

阿梅莉·戈德弗鲁特 (Amélie Godefroidt) 等学者在加纳发现政府能力是理解加纳公民产生政治信任的最关键因素。^[8]按照社会资本的逻辑,国家的有效治理是以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为前提,只有政府获得足够的政治信任,政府才具备治理能力。该逻辑通常建立在政治环境相对稳定的国家。对于这些后殖民国家而言,政府在谋求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重建之前,必须在国内民众面前展现强大的治理能力,才能让公民产生政治信任。从南非(1995—2006)发展来看,非国大领导南非取得反种族隔离斗争胜利并赢得首次民主选举后,获得了国内民众广泛支持。^[9]非国大之所以能够获取民众的政治信任,关键在于其通过强有力的政府能力与有效的治理绩效,巩固了执政合法性。这在尼泊尔得到了相同验证,新生政权所构建的政治信任并非源于种族、宗教和社会观念,而是依靠国家能力改善住房等治理绩效基础之上,从而培养了公民政治信任。^[10]

从政府能力视角来看,政治信任的生成逻辑主要呈现出两种取向,在政治稳定的国家,政府通过绩效来展现国家能力,在供给“有效性”基础上建立政治信任。而有过殖民历史,处于秩序重构中的国家,需要先向民众展现政府能力,才能构建稳固的政治信任。前者所形成政治信任是凸显政府有效性,而后者则是构建政府合法性(见图1)。目前,海外研究普遍认为政府能力是政治信任的内因,而未能明确区分其作为政治信任前因与作用机制之间的界限,这也正是未来研究需要理清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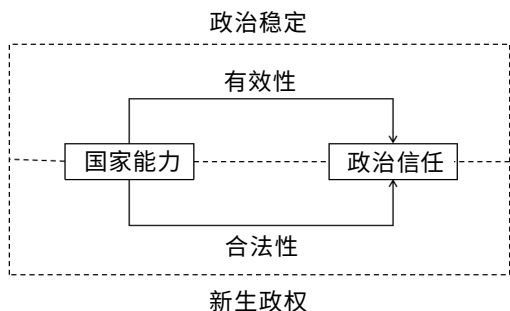


图1 国家能力逻辑下的政治信任

(二)文化属性视角

在文化属性视角下,政治信任植根于文化和社会传统。文化逻辑认为,政治信任是个体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内在信任特质和行为规范。然而,全球范围内政治信任普遍下降的趋势并未在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得到体现。在海外学者看来,东亚受儒家文化影响,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是政治信任的产生根源,长期和根深蒂固的文化取向为建立政治信任提供了路径。任何制度与公民的基本价值观和原则相悖,都难以建立政治信任。^[11]在儒家文化影响下,东亚国家有着极强的集体观念,为了社会和谐、集体利益愿意牺牲个人利益,集体主义精神使得东亚国家拥有较强的政治信任。^[12]相对于西方个体主义而言,集体主义使公民更注重对内群体的忠诚,对于他们而言,与国家权威团结一致更为重要,而不是基于个人成本收益来评价国家权威。

与集体精神所不同的是,伊什蒂亚克·贾米尔 (Ishtiaq Jamil) 认为公民对国家权威的信任源于先天的等级文化取向^[13]。在此文化背景下,公民对权威有着天然服从,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可能受到阻碍,从而形成适当性逻辑,这可能导致公民在思考和评估权威的表现时较少依赖评价逻辑,而更为自然地产生对国家权威的信任。^[14]部分学者则认为东亚新兴市场国家政治信任根源来自于中国古代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下所形成的亚文化。吴嘉瑞 (Cary Wu) 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已上升为等级制,使公民倾向于“将道德归功于皇帝”,“将出错事情归咎于朝廷官员”,从而增强公民对国家的信任^[15]。在传统儒家文化下,家庭关系中的孝道逻辑可以外溢到政治领域,将私人领域的“孝”转化为公共领域的“忠”,从而塑造公民对国家权威的政治忠诚。可见,在忠孝观的影响下,公民对国家的信任是由私领域的“孝”上升到公领域的“忠”,由“孝父”到“忠君”,自然萌生对权威的信任。

总的来看,文化观点关注的是文化的自主效应,认为对传统价值观和信仰本身就是政治

信任的充分原因。^[16]公民在尚未产生社会化效应前,个体已在潜移默化间产生了国家信任观念。当前,文化视角聚焦于东亚,且以中国研究居多,但不可否认的是,既有研究带有西方固有价值判断的偏向,难以保持充分的价值中立。因此,用文化属性视角认识政治信任生成逻辑时,需要坚持价值中立立场,并注意避免将西方的文化范式不加区分地套用于中国语境。基于以上政治信任生成逻辑的梳理,新兴市场国家政治信任的不同逻辑视角给我们提供了经验参考。如果政治信任根植于文化,那么建立政府有效运作所必需的信任将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如果由社会网络所决定,则要重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但如果政府能力是前因,可以通过发展政治、提升经济等方式来建立政治信任,这意味着时间跨度要短得多。

(三) 社会资本视角

任何形式的信任都并非凭空而生,而是建立在一定基础条件之上。根据社会资本理论,政治信任生成的起点在于人际信任。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提出,社会资本包含两个核心要素:社会网络和信任规范。社会网络通过公民积极参与志愿组织而形成,并在公民之间产生互惠的信任规范。个体在参与互动中建立人际信任,并通过组织化平台(如志愿协会)建立更为广泛的社会信任。在社会信任的联结下,有助于促进有效的政治团体和政府机构的运作,从而生成公民对政府的政治信任。因此,从社会资本视角来看,人际信任是逻辑起点。个体在参加民间组织和公民社会活动中建立的人际信任,会拓展为更广泛的社会信任,并进一步扩散至政治领域,从而影响公民对政府的政治信任——可视为人际信任的“溢出效应”。同时,政治信任又会反向强化人际关系,形成循环互动的动态机制(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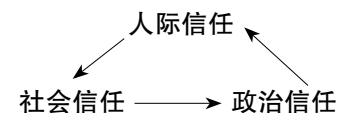


图2 人际信任、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

阿什利·罗斯(Ashley Ross)在拉丁美洲发现建立于社会资本基础之上的政治信任更稳固,在政党负责和个人负责两种选举制度中,一旦出现经济衰退,选民更倾向于对后者表达不信任^[17]。这说明,当政治信任依托于政党等组织所构建的社会信任,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即使领导者出现决策失误,凭借政党的人际链接,仍会维持政治信任。在巴基斯坦研究中,卡西姆·阿克特(Qasim Akhter)等学者认为,由人际信任所扩展的社会资本是政治信任生成的前因,公民在参与社会活动中,会通过周围其他人信息传递等方式认识到政府的优缺点,进而生成政治信任。^[18]肯·牛顿(Ken Newton)在人际关系基础上,细划为普遍关系与特殊关系,认为二者是政治信任的必要原因,但不是充分原因。^[19]在波兰投票选举中发现,特殊关系对政治信任更为关键,特殊信任对公民生成政治信任有着更强的引导作用,公民投票选择的主要参照点是其群体中的成员身份,决定了他(她)投票行为。^[20]

在社会资本视角下,政治信任被理解为人际信任在政治领域的延伸。社会资本逻辑表明,政治信任的生成离不开社会化过程的作用。如果忽视该过程,就难以充分理解政治信任的生成。政治信任与社会关系紧密相连,通过公民的社会化活动得以表达。密集的社会网络和组织化平台不仅能够培育高度的社会信任,也有助于催生较高水平的政治信任。

三、政治信任的相关性因素

多元化的研究视角为学者理解新兴市场国家政治信任提供了新的分析路径。随着学界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持续关注,相关研究不断深化,学者们开始从多维角度探讨政治信任波动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

(一) 国家场景对政治信任的影响

1. 腐败 政治信任的测量可以作为评估政治制度健康和活力的温度计,目前,不同的评

价都被总结为一个全面和单向度的政治信任表达,如对经济制度的信任就是对所有制度的信任。事实上,大量研究证明无论经济发展水平如何,腐败都是影响公民信任国家的重要因素。莫里森(Morris)和克莱纳(Klesner)在墨西哥发现了腐败与政治信任存在着内在反作用,公共机构的信任会受到更高程度腐败的侵蚀,腐败指数上升10%会导致政治信任指数下降16%以上,而政治信任指数上升10%会导致腐败指数下降约6%。^[21]虽然腐败通常会削弱政治信任,但这种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随着公民对公共机构信任程度的提升,其对腐败感知会相应下降,但这种关系表现出异质性。例如,公民对总统的信任并不意味着其认为总统幕僚不存在腐败;如果公民认为总统幕僚卷入腐败活动,则往往会对总统产生不信任^[22]。可见,无论何种形式的腐败都会削弱公民的政治信任水平;而政治信任对腐败感知的反馈效应则影响有限,证明腐败对政治信任的影响表现为单向度因果关系。

2. 不平等 持不平等观点的学者并未否认腐败对政治信任的影响,而是认为二者之间存在“不平等陷阱”^[23](见图3)。社会不平等会抑制政治信任,低政治信任又滋生高腐败,而高腐败进一步加剧不平等,形成循环累积的效应。随着腐败侵蚀国家资源,不平等也会随之增长。当腐败占用了国家资源,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停留在低水平,资源逐渐向既得利益群体集中,国家难以通过公共政策调节分配不均。结果,社会不平等持续扩大,政治信任不断被削弱,腐败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得到催化,将导致政治信任降低滋生更多的腐败,最终陷入无止境的恶性循环。然而,约翰·伊希亚马(John Ishiyama)等学者通过对非洲、拉美新兴市场国家的研究发现,不平等在不同层面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并不一致。^[24]根据“资源诅咒”理论启示,资源充裕的国家往往面临发展不足,资源不平等在国家层面确实加剧了腐败,从而削弱政治信任。然而,在国内层面,情况更为复杂。与非产油区相

比,产油区公民普遍表现出更高的政治信任。公民却表现出更高的政治信任。这种信任差异源于资源分配效应,非产油区公民将自己视为不平等的“受害者”,而产油区的公民因受益于资源收入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恩惠,对政府表现出更强的政治信任。由此可见,不平等观点打破了腐败对政治信任单向度影响的解释——无论腐败是不平等与政治信任的中介变量还是结果变量,均难以脱离不平等的解释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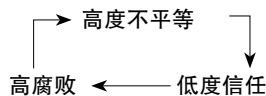


图3 不平等与政治信任、腐败

3. 战争冲突 不同于发达经济体国家,新兴市场国家有过战争记忆,当前部分新兴市场国家仍面临地缘冲突,如俄乌冲突等。战争冲突是否会对政治信任产生影响?马蒂亚·詹塞克(Matija Jancec)通过对巴尔干半岛国家和乌克兰的研究发现,战争冲突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是巨大的,边界的稳定性会影响公民的政治信任。^[25]战争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两个理论图景。其一是“团结一致”理论,该理论认为当国家面临外部威胁或领土冲突时,公民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绪被激发,从而强化对国家及其政治体制的信任,受外部威胁的领土争议国的国民会产生强烈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意识,强化对国家及其政治体制的信任,进而达成爱国主义集体行动。然而,非洲新兴市场国家的相关研究发现,政治信任并不会因外部威胁而增强。相反,战争威胁往往会削弱个体对其国家及政治机构的信任。^[26]因此,另一个理论图景——国家理论认为,面对外部领土威胁的国家,其公民政治信任往往低于未遭受外部威胁国家(见图4)。当国家遭受外部入侵时,公民可能会认为国家缺乏应对危机的能力,从而削弱公民对国家及其政治机构的信任。研究发现,经历过战争的公民,尤其是难民群体,往往对政府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失望和不信任。^[27]

“团结一致”理论与国家理论的共同点在于,二

者均自立于国家层面的外部冲突情境,而并未解释国内战争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对此,亚历山大·德·胡安(Alexander De Juan)基于尼泊尔(1996—2003)内战的研究指出,战争暴力的规模与政治信任有密切关联,战争受害者越多,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越低。^[28]然而,迈克尔·吉里根(Michael J. Gilligan)等人通过“信任游戏”实验发现,尼泊尔内战并未使社区陷入原子化,反而增强了社会内部凝聚力,促使公民达成集体行动来自我保护。^[29]从社会资本逻辑来看,社会信任应该促进政治信任。但证据恰恰相反,经历过政权更迭的国家中,内战和政治动荡普遍导致公民政治信任下降。^[30]战争虽然能够促使公民达成集体行动,但会进一步削弱政治信任。^[31]可见,战争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具有情境差异,外部战争会激发短暂的信任凝聚,而内战暴力则会侵蚀政治信任,甚至在强化社会联结的同时削弱国家合法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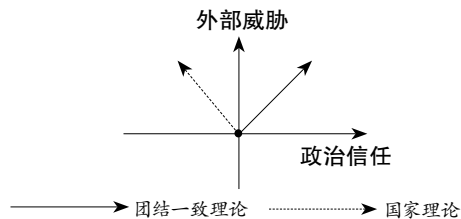


图4 “团结一致”理论与国家理论

(二) 机构运行对政治信任的影响

1. 媒体 关于媒体对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集中于媒体类型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一是,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在肯尼亚的调查中发现,电视新闻使用与公民的政治信任呈负相关,但政治绩效能够调节电视新闻对政治信任的负面影响,而腐败感知则会放大负面效应^[32]。此外,有学者认为,媒体主要通过议程设置和启动效应来影响政治信任,议程设置决定报道内容的具体呈现,启动效应则影响内容属性和价值导向。^[33]信息在不同类型媒介,不同传播方式下对公民政治信任及配合服从具有重要影响。^[34]当政府以积极方式报道信息可以提升政治信任,但随着媒体曝光周期延长,这种正向增长效应可能会逐渐消退。^[35]另一类型是官方媒体与社交媒

体。研究显示,受官方媒体影响较大的公民,其政治信任水平较高,而受社交媒体影响较大的公民,其政治信任水平相对较低。^[36]如图5所示,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影响的公民对政府在政治、自然与社会环境等多领域提出更高要求,从而形成“批判性公民”。官方媒体通过信息引导等方式抑制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从正向引导公民,增强其政治信任;而社交媒体则通过传播负面、失真或后物质主义的信息内容,降低公民对政府的评价,最终削弱公民的政治信任水平。然而,更为包容的研究指出,社交媒体包含大量能够唤起社会团结的内容,若政府合理借助、利用社交媒体发布可信赖的政治信息,可以有效增强公民的政治信任。^[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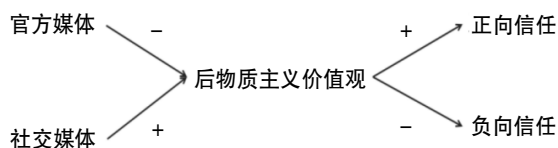


图5 官方媒体、社交媒体与政治信任

2. 司法机构 政治信任的客体是广义的政府,不仅包括政府职能机构,还涵盖司法机构,如警察、法院等。当公民在某一机构经历不公正经历时,这种不信任会产生溢出效应,由单一机构的不信任上升为整体性不信任。^[38]司法机构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与公民的日常生活联系密切,其公正性是政治信任研究的重要观测点。当公民处于怀疑和恐惧环境中,如果警察和法院等司法机构未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时,公民会对政治信任产生最大程度的负面影响。^[39]路易莎·布兰科(Luisa Blanco)在墨西哥的调查中发现,当司法机构无法打击犯罪时,犯罪受害者对政治信任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并降低对地方领导的支持。^[40]如果犯罪事件频发,警察等司法部门无法有效控制危险事件,公共精神受到侵蚀,社会合作便难以形成,从而陷入政治信任恶性循环。^[41]如图6所示,地区犯罪率上升会降低公民对司法机构的信任,而低信任则会导致公民对政府产生敌意,减少向司法机构提供犯罪信息,降低暴力事件调查的效

率,进而加剧犯罪频发。从社会资本逻辑出发,米格尔·卡雷拉斯(Miguel Carreras)指出,在暴力普遍存在的社区中,个人往往会放弃公共场所活动以规避风险,这种行为削弱人际信任,不利于政治信任的形成。^[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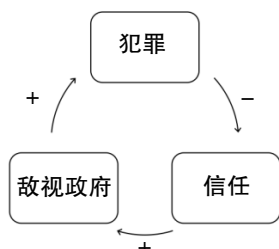


图6 犯罪与政治信任

3.电子政务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电子政务被视为建立可信任政府机构的重要手段(见图7)。政府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对公共行政进行电子化管理,向民众提供高效的行政服务。^[43]电子政府不仅提升了公共部门的透明度^[44],还为公民参与决策提供了渠道与机会^[45]。苏尼·基姆(Soonhee Kim)等学者发现,电子政务的信息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与政治信任呈正相关。^[46]如图7所显示,当政府通过电子政务提升信息透明度,并为民众搭建参与决策渠道时,公众会表现出更高的政治信任。然而,透明度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存在条件性。研究发现,以简明方式公布信息有助于提升公众对政府的积极评价,越详细的信息,公众会将注意力转移到政府具体行动,影响政治信任^[47]。此外,电子政务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也是影响政治信任的关键因素。有研究指出,服务质量是电子政务获取政治信任的关键变量^[48],若公民通过电子政务获得的信息无效或模糊,政治信任则难以持续,

如乌克兰建立了以服务公民为核心的电子政务,提高了政治信任;而白俄罗斯的电子政务偏重于行政管理,政治信任反而下降^[49]。格雷戈里·A·波伦贝斯基(Gregory A.Porumbescu)指出,电子政务对政治信任具有中介作用,当公民对政府绩效评价较高时,电子政务不仅可以增强政治信任,还能够提升信息透明度来缓解腐败对政治信任的负面影响。^[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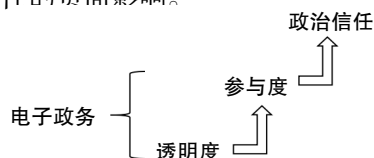


图7 电子政务与政治信任

(三) 公民层面: 影响政治信任的微观因素

政治信任的核心是主体(个体)和客体(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由个体的一般信任倾向以及其对国家绩效的主观评价共同塑造。从个体层面来看,公民会基于不同经历如教育、身份等对政治信任产生差异化认识。

1.教育 受现代化浪潮影响,新兴市场国家的免费教育普及率持续提升,学校作为社会化机构通过知识传授等社会化过程塑造普遍信任^[51],教育水平与政治信任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52]。然而,有研究发现,教育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情境依赖性。^[53]如图8所示,在后物质主义环境中,教育会发挥“批判效应”,培养“批判性公民”,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公民越倾向于质疑政治权威^[54];在精英主导型国家中,教育会发挥“使能效应”,增强公民对政治制度与行政机构的作用和功能^[55],从而加深政治信任;而在腐败环境中,教育则会产生“评价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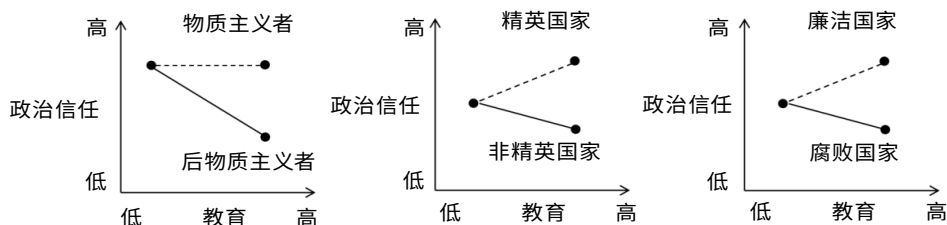


图8 国家环境与政治信任

资料来源:此图出自梅拉尔·乌古尔·希纳尔(Meral Ugur-Cinar)于2020年发表的论文《教育如何影响政治信任?:调节因素分析》,经笔者翻译、调整部分内容后,重制为中文图表。

应”，接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公民会对国家腐败行为持怀疑态度。然而，近期研究发现，在东南亚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并未因腐败而降低政治信任，反而呈现出一定的包容性^[56]。因此，有学者认为，教育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在于教育内容与观念对公民政治信任的塑造，如课程设置中蕴含着大量的爱国主义等文化教育，使得公民从小保持高水平政治信任。^[57]

2. 收入 有研究者将收入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划分为两个维度：客观不平等与收入公平感知，^[58]国家层面的客观不平等与个体感知并不总是同步，如果个体认为收入分配不公平，往往表现出较低的政治信任^[59]。对于分配公平的理解，不仅取决于实际收入差距，同时受到个体经济地位的影响^[60]，高收入群体普遍对现有状态持满意态度，而低收入群体则认为收入分配不公平，随着收入不公平感知加剧，社会内部的相对剥夺感上升，公民间的政治信任随之出现分化^[61]。由此，政治信任呈现出“赢家效应”，即高收入群体保持着较高水平的政治信任，而低收入群体的政治信任水平较低^[62]。然而，“赢家效应”并未在中东欧新兴市场国家得到验证。相反，在平等主义文化影响下，低收入群体因依赖国家福利而倾向于信任国家，而高收入群体以发达国家高收入群体作为参照物，由于国家表现未能达到预期，反而政治信任度较低^[63]。

3. 身份特征 公民身份作为政治信任研究中的重要社会变量，长期被当作控制变量使用，导致其作为自变量的影响作用被忽视。现有研究表明，公民的性别、年龄等身份特征对政治信任具有显著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取向。首先，性别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多数研究认为，男性政治信任高于女性，通过对非洲的新兴市场国家研究发现，男性对政府的信任是女性两倍^[64]。威洛·克鲁泽 (Willow Kreutzer) 指出，性别所显现的政治信任，其根源可能是政府忽视女性的特殊性，如当灾难出现时，政府应急反应往往考虑公

民的一般性，并未充分考虑妇女的特定需求^[65]。性别带来的政治信任差异还映射在政治权利中，如乌拉圭在增加女性代表配额后，妇女的政治信任程度高于男性^[66]。可见，当政府回应女性需求，改善政治包容性时，女性的政治信任水平随之提升。其次，年龄对政治信任的影响。现有研究较为统一的观点认为老年人相较与年轻人有着更高程度的政治信任。^[67]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衰老会降低认知能力，伴随而来的是信息处理能力的下降，会损害接受新价值观和新观点的能力。相反，青少年阶段的个体具有更强的认知参与和语言能力，这一阶段的政治社会化经历将会对其后期政治信任产生影响。^[68]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老年群体的政治信任与其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的稳定性密切相关，他们更倾向于维持现状，对既有社会秩序和政治权威持支持态度。^[69]最后，宗教信仰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在中世纪话语体系中，政治信任被视为对世俗权力的信任，与之相对便是以宗教为代表的神权。在现代国家体系中，一个核心特征是从宗教权威转向理性官僚权威，政府掌握着对资源“权威性支配的权力”，但这并非意味着宗教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已经消失。多数新兴市场国家有着西方国家殖民经历，宗教信仰在政治认知与权威合法性认同中仍扮演重要角色。在宗教信仰者看来，上帝是至高无上的，相信政府或政治权威，实质上是对神圣信仰的延伸与分享^[70]，相反，非宗教或世俗化群体的政治信任水平相对较高^[71]。然而，来自加纳的研究发现，宗教与政治信任呈现正相关，随着宗教不断修正教义，宗教成为促进个人社会化与国家认同的重要影响因素^[72]。在部分研究中，宗教作为一种保守势力，会抑制公民的批判意识，导致政治信任的“非理性膨胀”，甚至形成对政治权威的盲目信任。

四、政治信任的功能与效应

政治信任被视为衡量国家政治体系运行状

况的关键指标。在发达经济体国家,政治信任是维系制度运作与有效治理的基础。然而,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政治信任的功能更为广泛,既涉及政治秩序的维系,同时也关乎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因此,重新认识政治信任的功能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发展而言尤为重要。

(一) 政治信任的政治功能

政治信任是国家与公民的“桥梁”,当公民政治信任水平下降时,意味着政府在社会中的权威性与合法性逐步削弱,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距离随之扩大。国家作为“利维坦”,一旦失去公民信任,其政治、经济等制度体系将难以维系,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社会的信任和积极参与,国家改革也将难以有效推进。^[73]政治信任的流失将会削弱国家“资源权威性分配”的能力。池田健一(Ken' ichi Ikeda)认为,政治信任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74]如表1所示,当政府拥有政治信任时,公民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如投票、参加集会、参加示威、签署请愿书或联系政治家),来促进政治环境的健康发展,即1A模式。当公民不信任政府时,公民通过暴力参与等方式反对现政府,以重建可信的政府,出现1B模式。当公民对政府持过度信任时,则选择不参与政治,即出现2A模式,过度的信任会促使公民丧失对政府的警惕性和控制力^[7],涌现更多“犬儒型公民”。在2B模式中,长期的政治不信任会助长公民的政治冷漠,使其不关心,不参与公共事务,削弱社会整体政治活力。在中亚和东南亚的新兴市场国家发现,较高水平的政治信任会催生公民更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体系的稳定与建设^[75]。然而,需要引起关注的是,过高的政治信任有时候会诱发公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增加政治风险。政治信任程度高的公民往往会参与非正式政治活动,增加政治风险。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在提升政治信任的同时,应注重政治参与的制度化与规范化,引导公民在理性、有序的框架内参与政治,以避免过度或失序参与引发的潜在风险。

表1 政治信任模式与政治参与

政治信任	信任	不信任
政治参与	1A	1B
不参与政治	2A	2B

资料来源:此图出自池田健一(Ken' ichi Ikeda)于2013年发表的论文《东亚和东南亚的社会和制度信任》,笔者翻译后制成中文图表。

(二) 政治信任的经济效应

经济绩效是政府能力的直接体现。按照政府能力视角的逻辑,良好的经济治理不仅是政治信任的重要来源,同时也会反过来受政治信任的显著影响。当国家拥有较高的政治信任时,往往释放出积极的经济效应。但要区别的是,经济绩效不等同于经济效应,前者强调政府制定制度、营造良好经济环境等方式来提升经济水平;后者则是政治信任所带来的经济层面的反馈,即政治信任的结果表现。从社会契约论视角来看,公民之所以愿意自觉履行纳税义务,原因在于公民对国家的信任。政治信任的存在意味着公民对国家权威与合法性的认同,从而公民在履行义务时表现出较高的合作意愿。而一旦国家失去公民的信任,契约将自动终结,公民的纳税意愿下降,国家财税收入的缩减会削弱其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政治信任陷入恶性循环。学者用滑坡理论来解释政治信任的经济效应,当公众对国家机构和制度的信任度降低时,公民的纳税意愿会随之下降,反之亦然。^[76]任何破坏信任的事件都会降低逃税的道德成本,增加纳税人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在爱沙尼亚与立陶宛,尽管两国税收政策设计相似,但由于立陶宛政治信任水平较低,公民逃税现象更为普遍。^[77]因此,研究普遍认为,政治信任是税收合规的重要驱动因素,当国家失去政治信任时,国家任何形式的增税行为都有可能遭到公民抵制,^[78]国家的再分配能力受到削弱,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形成“信任缺失—财政困境—社会不平等”的恶性循环。

(三) 政治信任的社会效应

在国家场域中,政治信任能够将社会成员有机整合到国家框架中,并以信任为纽带对社会进行政治动员,而一旦政治信任缺失,公民可能会逐渐从国家体系中“脱嵌”,形成社会分离

现象。在印度与菲律宾的研究中显示, 尽管两国应对台风方式相似, 但结果截然不同。原因在于印度地方政府凭借较高的政治信任, 能够在灾前对社会形成有效动员, 而菲律宾由于缺乏政治信任, 导致公民拒绝配合政府动员^[79]。这种动员差异证明, 政治信任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关键机制。当国家缺乏信任时, 可能导致政民沟通不畅与公民非理性行为的自我强化循环, 加剧公民对政府的疏远和抵触。事实上, 政治信任可以视为社会与国家签订的“观念契约”。社会成员通过信任国家来换取国家强大力量的庇护, 并期待国家以稳定、公正、可预测的方式履行其公共责任。然而, 当国家出现腐败等失信行为时, 契约便会遭到破坏, 公民将以消极抵抗的方式做出回应。如利比里亚在失去公民政治信任后, 导致部分公民拒绝服从隔离防控政策, 不信任在埃博拉病毒防治中进一步自我延续^[80], 国家陷入失信“泥潭”。可见, 政治信任的社会效应会受到公民反向问责与社会反馈的制约。尤其在新兴市场国家中, 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张力尤为突出, 政府政策往往需要政治信任的“背书”才能获得社会支持。当政治信任不足时, 公民容易将环境恶化归咎于国家治理失效, 进而产生环境悲观情绪,^[81]当悲观情绪一旦发生溢出效应时, 国家合法性将被削弱, 社会可能进入表1所示的2B模式, 陷入政治冷漠与社会离心并存的风险。总体而言, 政治信任在社会领域具有双向效应, 能够增强社会整合与政治动员, 同时当其缺失会导致公民疏离。

五、结语：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启示

在系统梳理海外关于新兴市场国家政治信任的理论研究基础上, 结合中国语境下的既有研究成果可以发现, 国内关于政治信任的研究存在碎片化、分散化的问题, 亟需突破既有范式的局限, 积极构建具有自主性与体系化特征的中国政治信任研究路径。在理论层面, 要基于中国

案例, 发展本土化的政治信任评价体系, 以提升对海外研究的回应与修正能力。中国长期高速发展的经济事实与维持高水平的政治信任已经揭示海外的文化属性研究进路对中国案例缺乏解释力。中国的历史文化积淀中有善治理念、民本思想等传统文化, 并非海外研究中所固有的等级权威、家长制等偏见认知。另一方面, 随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推进,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体现出对制度绩效、回应能力与政治参与的现实回应。因此, 应在理论上重构文化解释路径, 将中国的民主政治实践纳入理论分析框架, 从而推动中国经验对海外理论的修正, 并提升理论对话能力。此外, 中国的政治信任研究还需在方法论层面突破海外研究的既有范式。海外研究多依赖量化方法, 强调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但缺乏分析深度。中国研究应围绕特定主题构建知识谱系, 结合定性研究、历史分析、田野调查等多重方法, 深入探讨政治信任的生成逻辑与实践基础, 以提升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同时, 海外研究对政治信任多重影响因素的揭示, 为中国的治理实践提供了有益启示。在实践中, 应持续强化反腐倡廉建设, 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回应社会关切, 提升制度公信力。政府应利用线上线下等媒介及时发布社会热点事件, 防止信任缺口扩大。此外, 应借助数据技术优势, 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政务平台, 建立有效的线上回应与疑难疏解机制, 提升政民间的有效政治互动。总之, 政治信任的构建需要立足本国实际, 在批判性吸收海外研究经验的基础上, 推进理论与实践协同发展, 构建具有解释力与话语权的本土政治信任研究体系。

参考文献：

- [1]郭红玉, 杨美超. 金融开放背景下实际资本管制能力对金融危机影响的实证研究[J]. 国际金融研究, 2019(9): 43-53.
- [2]CITRIN J, STOKER L. Political trust in a cynical age[J].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8(21): 49-70.
- [3]王正绪. 政治信任研究：民本主义的理论框架[J].

开放时代, 2022(2): 179-193, 9.

[4] 李晓静. 融媒体如何促进中国青年的政治信任?——基于链式双重中介模型的考察[J]. 新闻界, 2023(9): 46-57.

[5] CERMAK D, MIKESOVA R, STACHOVA J.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trust: Comparing the Vysocina and Usti Regions[J].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16, 49(2): 137-146.

[6] ZHAI Y D. Popular democratic perception matters for political trust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J]. *Politics*, 2018, 39(4): 411-429.

[7] GOUWS A, HERZENBERG C S. What's trust got to do with it? Measuring levels of political trust in south Africa 20 years after democratic transition[J].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tudies*, 2016, 43(1): 7-29.

[8] GODERFROIDT A, LANGER A, MEULEMAN B. Developing political trust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factors on political trust in Ghana[J]. *Democratization*, 2017, 24(6): 906-928.

[9] ASKVIK S. The dynamics of political trust in South Africa, 1995-2006[J]. *Politikon*, 2010, 37(1): 25-44.

[10] ASKVIK S, JAMIL I, DHAKAL T N. Citizens' trust in public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Nepal[J].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1, 32(4): 417-437.

[11] CHEN D. Local Distrust and Regime Support: Sources and effects of political trust in China[J].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2017, 70(2): 314-326.

[12] WONG T K Y, WAN P S, HSIAO H.H.M. The bases of political trust in six Asian societies: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explanations compared[J].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1, 32(3): 263-281.

[13] JAMIL I, BANIAMIN H M. How culture may nurture institutional trust: Insights from Bangladesh and Nepal[J].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021, 39(3): 419-434.

[14] BANIAMIN H M. Linking socio-economic performance, quality of governance, and trust in the civil service: Does culture intercede in the perceived relationships? Evidence from and beyond Bangladesh, Nepal and Sri Lanka[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9, 41(3): 127-141.

[15] WU C, WILKES R. Local-national political trust patterns: Why China is an exception[J].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8, 39(4): 436-454.

[16] SU Z H, CAO Y, HE J K, et al. Perceived social mobility and political trust in China[J]. *African and Asian Studies*, 2015(14): 315-336.

[17] ROSS A, LEMMON M E. The price of personalizing politics: Political distrust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Latin America, 1996-2006[J]. *Electoral Studies*, 2011, 30(3): 406-416.

[18] AKHTER Q, HAQ M, RASHID A. Exploring determinants of trust in governmen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pakistan[J]. *NICE Research Journal*, 2022, 15(3): 48-68.

[19] NEWTON K, ZMERLI S. Three forms of trust and their association[J].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1, 3(2): 169-200.

[20] KAWA A T. Political trust and electoral behaviour[J]. *Polish Political Science*, 2013(42): 91-108.

[21] MORRIS S D, KLESNER J L. Corruption and trust: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evidence from Mexico[J].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10, 43(10): 1258-1285.

[22] PULLBECK J, TCHATOKA F D. Inherent effects of corruption on the erosion of political trus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Ghana[J]. *Working Papers*, Adelaid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2020-1.

[23] USLANER E M. Trust and corruption revisited: How and why trust and corruption shape each other[J]. *Quality & Quantity*, 2013(43): 2303-3608.

[24] ISHIYAMA J, MARTINEZ M, OZSUT M. Do "resource-cursed states" have lower levels of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trust? evidence from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2018(99): 872-894.

[25] JANEC M. Do less stable borders lead to lower levels of political trus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Eastern Europe[EB/OL]. (2012-9-19)[2024-06-06]. <https://dx.doi.org/10.2139/ssrn.2148773>.2013.

[26] HUTCHISON M. Territorial threat and the decline of political trust in Africa: A multilevel analysis[J]. *Polity*, 2011, 43(4): 432-461.

[27] HALL J, WERNER K. Trauma and trust: How war exposure shapes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 trust among refugees[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2(13): 1-21.
- [28]JUAN A D, PIERSKALLA J H. Civil war violence and political trust: Micro-level evidence from Nepal[J].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2014, 33(1): 67-88.
- [29]GILLIGAN M J, PASQUALE B J, SAMII C. Civil war and social cohesion: Lab-in-the-field evidence from Nepal[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4, 58(3): 604-619.
- [30]SPIERINGS N. Trust and tolerance across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impact of the Arab Uprisings[J].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2017, 5(2): 4-15.
- [31]CASSAR A, GROSJEAN P, WHITT S. Legacies of violence: Trust and market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13, 18(2): 285-318.
- [32]KIPKOECH G. Media use and political trust in Kenya: Media malaise or virtuous circl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23(17): 2643-2664.
- [33]CAMAJ L. Media use and political trust in an emerging democracy: Setting the institutional trust agenda in Kosovo[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4, 8(1): 187-209.
- [34]IM T, CHO W, PORUMBESCU G, et al. Internet, trust in government, and citizen compliance[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14, 24(3): 741-763.
- [35]YOU Y, HUANG Y F, ZHUANG Y Y. Natural disaster and political trust: A natural experiment study of the impact of the Wenchuan Earthquake[J].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2020, 6(1): 140-165.
- [36]CHEN J N, SUN L Y. Media influence on citizens' government trust: A cross-sectional data analysis of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9, 42(13): 1122-1134.
- [37]LISSITSA S. Effects of digital use on trust i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mong ethnic minority and hegemonic group—A case study[J]. *Technology in Society*, 2021(66): 1-11.
- [38]LEVITT B S. Discrimination and the distrust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in Latin America[J]. *Politics, Groups, and Identities*, 2013, 3(3): 417-437.
- [39]MALONE M F T. The verdict is in: The impact of crime on public trust in central American justice systems[J]. *Journal of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2010, 2(3): 99-128.
- [40]BLANCO L R. The impact of crime on trust in institutions in Mexico[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3(32): 38-55.
- [41]CORBACHO A, PHILIPP J, VEGA M R. Crime and erosion of trust: Evidence for Latin America[J]. *World Development*, 2015(70): 400-415.
- [42]CARRERAS M. The impact of criminal violence on regime legitimacy in Latin America[J].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2013, 48(3): 85-107.
- [43]WIRTZ B W, PIEHLER R, DAISER P. E-Government port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dividual appeal: An examination of E-government and citizen acceptance in the context of local administration portals[J]. *Journal of Nonprofit & Public Sector Marketing*, 2015, 27(1): 70-98.
- [44]CUCCINIELLO M, NASI G. Transparency for trust in government: How effective is formal transparenc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4, 37(13): 911-921.
- [45]CHEN Y C. Citizen-centric E-Government services: Understanding integrated citizen service information systems[J].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2010, 28(4): 427-442.
- [46]KIM S, LEE J. E-Participation, transparency, and trust in local government[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2, 72(6): 819-828.
- [47]PORUMBESCU G A. Linking public sector social media and E-Government website use to trust in government[J].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016, 32(2): 291-304.
- [48]ABDULKAREEM A K, ABDULKAREEM Z J, ISHOLA A A, et al. Does E-Government impact E-Participation? The influence of trust in E-Government[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21, 27(2): 91-110.
- [49]MATVEIEVA O, NAVUMAU V, GUSTAFSSON M, et al. Adoption of public e-services versus civic tech services: On the issue of trust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Ukraine and Belarus[C]. *Electronic Government: 21st IFIP WG 8.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22: 15-30.
- [50]PORUMBESCU G A. Placing the effect? Gleaning insights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izens' use of E-Government and trust in government[J].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016,

18(10): 1504-1535.

[51]MARIEN S. Assessing the role of television, the family, and the school in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trust in adolescence[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2017, 98(3): 818-835.

[52]MILES D, ROSSI M. Trust and confidence in institutions: Religious beliefs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J]. *European Scientific Journal*, 2018, 14(17): 1-11.

[53]CINAR M U, CINAR K, KOSE T. How does education affect political trust? : An analysis of moderating factors[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20, 152(2): 779-808.

[54]JIANG A L, WANG Z X, ZHANG T H Q. Radicalizing and Conservatizing: Ageing effects on political trust in Asia, 2001-2016[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22, 162(2): 665-681.

[55]Chow J K F, Kennedy K J. Citizenship and governance in the Asian region: Insight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ivic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tudy[J]. *Public Organization Review*, 2012, 12(3): 299-311.

[56]JIANG A L, ZHANG T H. Political trus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The joint effects of education, corruption perception, and urbaniz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021, 33 (4) : 911-926.

[57]HUANG H F, INTAWAN C, NICHOLSON S P. In government we trust: Implicit political trust and regime support in China[J].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023, 21(4): 1357-1375.

[58]ZMERLI S, CASTILLO J C. Income inequality, Distributive fairness and political trust in Latin America[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5(52): 179-192.

[59]LEE D, CHANG C Y, HUR H. Economic performance, income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trust: New evidence from a cross-national study of 14 Asian countries[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20, 42(2): 68-88.

[60]CANSUNAR A. Who is high income, anyway? Social comparison, subjective group identification, and preferences over progressive Taxation[J].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2021, 83(4): 1292-1306.

[61]CIZICENO M, TRAVAGLINO G A. Perceived corruption and individuals' life satisfac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stitutional trust[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9, 141(2): 685-701.

[62]LOVELESS M. The deterioration of democratic political cul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perception of inequality[J].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013, 26(4): 471-491.

[63]BALINT G M, BODA Z. The poorer you are, the more you trust? The effect of inequality and income on institutional trust in east-central Europe[J]. *Czech Sociological Review*, 2014, 50(3): 419-453.

[64]BOURNE P A. Modelling political trust in a developing country[J]. *Current Research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0, 2(2): 84-98.

[65]KREUTZER W. Women's support shaken: A study of women's political trust after natural disasters[J]. *Politics & Gender*, 2023, 19(3): 703-733.

[66]HINOJOSA M, FRIDKIN K L, KITTLILSON M C. The impact of 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 on "persistent" gender gaps: Political engagement and political trust in Uruguay[J]. *Politics, Groups, and Identities*, 2017, 5(3): 435-453.

[67]GOZGO G. Global evidence on the determinants of public trust in governments during the COVID-19[J].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2022, 17(2): 559-578.

[68]SEREK J, MACEK P. Antecedents of political trust in adolescence: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perceptions of Parents[J].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4, 35(4): 284-293.

[69]GELEPITHIS M, GIANI M. Inclusion without solidarity: Education, economic security, and attitudes toward redistribution[J]. *Political Studies*, 2020, 70(1): 45-61.

[70]NESHKOVA M I, KALESNIKAITE V. Corruption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local government: Evidence from Latin America[J]. *Governance*, 2019, 32(4): 677-693.

[71]IROGHAMA I P. Trust in Government: A note from Nigeri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Busines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2, 2(6): 38-45.

[72]ADDAI I, AGYEMAN C O, GHARTEY H T.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religion and trust in Ghana[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3, 110(3): 993-1012.

[73]Serohin S, Sorokina N, Pysmennyi I. Restoring trust in government as a prerequisite for the formation of effective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 Ukraine[J].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2020, 19(4): 195-208.
- [74] IKEDA K.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trus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J].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2013, 9(1): 13-45.
- [75] KIM H H. Generalised trust, institutional trus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 cross-national study of fourteen southeast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J].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2014, 43(6): 695-721.
- [76] HANING M T, HAMZAH H, TAHILI M H.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 of public trust on tax compliance[J]. *Bisnis & Birokrasi: Jurnal Ilmu Administrasi Dan Organisasi*, 2019, 26(2): 97-105.
- [77] KUOKSTIS V. Trust and taxes: Estonian and Lithuanian fiscal performance during the crisis[C/OL]. *APSA 2012 Annual Meeting Paper*. (2012-08-27)[2024-06-18]. <https://ssrn.com/abstract=2104562>.2012.
- [78] LIM J Y, MOON K K. Political trust and support for a tax increase for social welfare: The role of perceived tax burden[J]. *Sustainability*, 2022, 14(12): 1-12.
- [79] WALCH C. Evacuation ahead of natural disasters: Evidence from Cyclone Phailin in India and typhoon Haiyan in the Philippines[J].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2018, 5(1): 1-16.
- [80] BLAIR R A, MORSE B, TSAI L L. Public health and public trust: Survey evidence from the Ebola virus disease epidemic in Liberia[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7(172): 89-97.
- [81] VERNER M. Political trust and ecological crisis perceptions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Ecuador[J].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2023, 65(4): 147-175.

【责任编辑 史 敏】

The Generation Logic,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Functions of Political Trust in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A Research Review Based on Overseas Literature (2010–2024)

SUN Hao

Abstract: Political trust, a core concept in political science, is considered a crucial factor for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modern 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s. Early research on political trust largely focused on the political experiences of developed Western countrie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developed Western countries have generally experienced a continuous decline in political trust.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political trust in developed Western countries has proven insufficient to explain this trend, leading overseas scholars to gradually expand their research focus to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attempting to explore the generation logic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political trust under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s and social structures. By reviewing overseas research on political trust in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since 2010, it can be found that overseas research mainly revolves around three paths: state capacity, cultural attributes, and social capital, forming the basic logical framework for the generation of political trust in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From the macro-level national context and meso-level institutional operation to the micro-level citizen perception, multiple levels influence political trust. When a state can effectively build and maintain political trust, the resulting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trust dividends” will help improve the overall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of the state. Based on overseas research on political trust in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future studies on political trust in my country should be more grounded in local political practices and social contexts, establishing a political trust evaluation system that aligns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litical trust theory within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At the practical level, this requires deepening anti-corruption efforts, enhancing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and responding more proactively to public concerns to continuously consolidate and strengthen political trust, thereby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Keywords: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political trust; corruption; interpersonal trust